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工人运动史稿

齐武著

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工人运动史稿

齐 武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工人运动史稿

KANGRIZHANZHENG SHIQI
ZHONGGUO GONGREN YUNDONG SHI GAO
齐武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85,000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1001·883 定价 2.10元

说 明

一、本书所说的工人运动，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运动。包括工会运动，但不限于工会运动；侧重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也不忽略工人自发的行动。

一、抗日战争时期，通指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个时期。本书遵循这个通例。但就东北地区来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处于战争状态了。所以，绪论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各地工人运动从低沉到恢复的过程，作为抗战时期工人运动的前奏作了简短的叙述。

一、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因领导机关处于地下，情况很少为人们所知道。直到抗战胜利，才渐露锋芒。如果不对战后的情况略事叙述，便无由窥见战时工人运动的成就与作用。所以，第六章突破抗战时期的下限，介绍了从抗战胜利到内战全面爆发这一过渡时期（1945年9月—1946年6月）重庆、上海两地工人的斗争。目的即在使运动的面貌多少能首尾俱见。

一、书的结语，顾名思义，自是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因作比较，不免涉及其它历史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一般讨论。所占篇幅，也增加了许多。有背体例，所以称“代”。

目 录

绪 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形势	1
第一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4
第一节 芦沟桥事变，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工人运动的方针和任务	14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溃败，战区和临近战区工人的 抗日救亡运动	19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工会工作的整顿和对全国工人 运动的推动	27
第四节 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中的工人运动	34
第五节 开滦煤矿工人的同盟罢工与武装起义	43
第六节 海外华工的反日爱国活动	53
第七节 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右倾机会主义对 它的影响	56
第二章 为坚持敌后抗战而斗争的根据地工人运动	64
第一节 根据地工人的深入发动和劳动政策的贯彻	64
第二节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	75
第三节 整风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改进	86
第四节 新劳动者运动	95
第五节 根据地工人生活的改善	100
第三章 抗战相持阶段沦陷区的工人运动	110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掠夺及摧残(一)	110
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 掠夺及摧残(二)	118
第三节 沦陷区工人阶级状况(一)	128
第四节 沦陷区工人阶级状况(二)	142
第五节 上海“孤岛时期”的工人斗争	161
第六节 其他城市、矿区和铁路沿线的工人斗争	174
第七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工人运动的退却	184
第四章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	195
第一节 国统区工业的一度发展, 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一)	195
第二节 国统区工业的一度发展, 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二)	206
第三节 国统区工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一)	213
第四节 国统区工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二)	227
第五节 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统制”	235
第六节 荫蔽精干政策的贯彻, 国统区工运工作走向深入	245
第七节 四川盐工反对抓丁的斗争	254
第八节 中国劳动协会和工人运动的统一	262
第五章 抗战后期和反攻阶段的工人运动	275
第一节 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增长, 工人争生存; 争民主的斗争	275
第二节 胡世合事件, 国统区工人斗争新的来潮	286
第三节 解放区工人积极投入反攻准备工作, 工运工作 新任务的提出	292
第四节 东北地区工运工作的重新开辟	299
第五节 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成果而斗争	308
第六章 过渡时期(1945年9月—1946年6月) 国统区的工人运动	313
第一节 重庆工人的罢工斗争	313
第二节 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324

代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 基本经验	334
后 记	375

绪 论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 工人运动的形势

(一)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中日两国就进入局部的战争状态。从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进攻步步加紧。虽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侵略者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在这个民族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占着重要地位。它从消沉（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结果）到恢复到发展的过程，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屈辱投降政策的过程，是紧密相联的。

“九一八”事变，是自 1895 年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称霸东亚的帝国主义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变的爆发，宣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跨进了新的阶段：企图把中国从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改变为日本一国独占的殖民地的阶段。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坚持反革命内战，对外实行屈辱投降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日本军队于席卷东北三省之后，1932 年 1 月 28 日又在上海发动了新的进攻。同年 5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继续对侵略者屈膝退让。

1933 年 1 月 3 日，日军进占山海关；2 月底占领热河；3 月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及滦东要隘，威胁平、津。5 月 31 日，国民党政

府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从而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控制华北准备了条件。

1935年1月，和冀东伪化、河北省会移驻保定及撤退华北中国驻军同时，蒋介石在北平捕杀了第一次平沈通车时在茶淀炸车的反日志士史灿堂，并在天津枪杀了唐山反日罢工的工人领袖三人，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①

1935年5月29日，驻天津的日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遣大批日军入关，对中国进行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态度强硬的《觉书》，要求对华北的控制权。7月6日，何应钦复函接受了日方条件，拱手让出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这就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一年的10月—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了香河“暴动”，并扶持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而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逼下，于1935年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准“自治政府”，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华北山河变色，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日本，在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时，缺乏必需的大量资本与技术设备，它实行的是封建的军事法西斯的武力征服政策。其侵略公式是：利用地理上的接近，首先要求对中国某一地区的政治支配，然后在它的统治之下，利用从外国借得的资本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开发中国的富源。按照这一公式，日本帝

^① 1935年1月19日纽约《先锋论坛报》143期。

国主义者首先在东北攫取“特殊的经济和战略权利”，然后派军队去“保护”这种“权利”，即把东北变作它的独占殖民地。然后再依样葫芦地在华北重演一遍。所以远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侵略者就已经大叫大喊地讲什么它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了。这就意味着，华北行将成为另一个东北，而整个中国都将步东北、华北的后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囊中物。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行动，都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人民，包括一部分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违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意愿，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和武装抗日活动。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打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破坏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不以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国内各阶级间的矛盾、各政治集团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相对地下降。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愈挫愈奋，他们的斗争更加坚决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为全国人民指出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方向。同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直接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爆发。运动有力地冲破了蒋介石政府长期的法西斯统治，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新高涨的起点。北平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响应。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相继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一致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全力反击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的情况下，1935年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全党为贯彻这一方针而斗争。

（二）

当时，在“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遭到严重挫折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迷恋过去的“赤色工会”那一套做法；在陕甘边区，工会工作中也存在着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些情况，都严重地阻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对于工运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批判，以总结经验和提出新的适合客观情况的工运方针，已经成为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早在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党“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由于当时正处在长征途中，还没有实际可能来贯彻这个决定。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便立即着手解决工人运动的方针问题。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针对当时陕甘边区工人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提出：工会工作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在改善工人生活中，要纠正行会主义倾向；在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中，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增产节约，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业而努力。^①这个决定给陕甘根据地的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献汇编》。

工会工作，也给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会工作，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决定》还要求边区工会：“应特别注意去进行白区工人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帮助白区工人的斗争”，“特别要吸引白区工人来参加反日、反卖国贼的运动。”^①

1936年4月，刘少奇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论文和《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系统地批判了1927年革命失败以来国统区群众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文章列举了在“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群众工作从总的方针、策略原则，到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严重危害。文章沉痛地指出：由于这些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结果使得党在白区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和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文章最后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彻底揭发并肃清这些错误，才能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②《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对于如何在工人运动中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首先在总的方针上，《提纲》指出：“党目前在中心城市和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当时，中心城市和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对于革命力量的镇压最为严厉，同时革命力量在这些地方又十分薄弱。《提纲》提出的这个总方针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实际情况。关于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提纲》认为：“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谈到扩大和发展。而当我们在某些工厂中已经建立了强大组织时，则要注意巩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献汇编》。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33页。

固组织,培养干部,开辟其他工厂的工作,派遣积极分子到农村去参加革命战争和参加公开的社会政治活动;要避免单独和敌人作战,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提纲》认为:“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在领导斗争时,又“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要用一切方法使斗争得到胜利。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条件下“适可而止”,停止战斗。在阐释斗争的策略原则时,《提纲》特别强调了利用合法形式与公开斗争的重要作用。《提纲》指出:工运工作者要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广泛组织工人群众。在有黄色工会的工厂企业中,要加入黄色工会,参加它的各种活动,利用它来组织工人;在没有黄色工会的工厂企业中,应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名义,广泛组织工人;在没有组织的工人中,如果情况允许,不要放弃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公开成立新工会的机会。《提纲》认为:要特别注意在黄色工会中形成和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不论上级和下级,都要努力争取。当这项工作获得全部胜利时,仍要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力求巩固已得阵地,培养大批干部,以待将来。《提纲》要求革命工运工作者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与各派工人及其领袖进行统一战线,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的积极活动。《提纲》着重指出,在斗争中要注意保存群众中、企业中的干部和领袖,并要求党的工作同志在实际斗争中去克服那些可能发生的“左”的或右的错误。^①

文章和《提纲》所反覆强调的根本策略思想,就是后来毛泽东概括地称之为“荫蔽精干”政策的思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它确立了从长期着眼积蓄革命力量的指导方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40页。

针。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敌占城市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根本方针。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和长期性。因而从长期着眼积蓄力量,必然是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方针。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工运工作的领导机关,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此缺乏认识。当时的领导机关,甚至把这种正确意见称之为“机会主义”,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则受到指责和打击。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十年中,工人运动的这个总方针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正是在革命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最是要求保存干部和积蓄力量,以促进和准备未来的革命高潮的时候,白区工人运动却没有把积蓄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总方针。而是相反地盲目冒进,浪费和损耗力量,结果造成了如前引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悲惨失败和严重损失。刘少奇的文章和《提纲》,对于在实际工作中抛弃“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盲动路线,切实完成工运工作根本策略方针从错误向正确的转变,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由此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工农红军的内战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政治任务。报告指出:民众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要在

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加以肃清。^①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也强调党和群众工作必须执行一个“全般的、彻底的转变”。^②

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关于职工运动的经验及转变方式问题》的文件。文件指出：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企图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工人运动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其他外国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为了发动整个工人阶级参加抗日战争，仍须发动工人的民主运动和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些斗争（对日资的斗争除外），一般应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态度；如果某些条件为资方所无力负担的话，工人还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作不得已的牺牲和忍耐。文件根据三种地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地区）和各种不同情况（如日本在华企业等），着重提出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式方法问题。文件详尽地提出了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及在日资工厂中工运工作的方法、方式与斗争策略，并要求工运工作干部根据形势，决定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而不论任何的组织形式，都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不要流于形式主义。文件明确地规定了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任务是：组织全部工人参加抗日战线，努力建设根据地。文件告诫说：为了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据地工人运动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如果不这样，处处要求工人片面的利益，就会出现不正当的罢工，就会妨碍抗日斗争的顺利发展。^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区的工人运动正是在上述决议、报告、文章和文件的精神指导下，走上正确道路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27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7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卷，第711—720页。

(三)

白区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从错误路线转到正确路线的第一个重大表现，是1936年11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这次罢工是中国人民反日爱国运动走向新高潮的标志。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

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斗争已经有所恢复。工业和工人集中的上海，这种情形尤为显著。据上海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36年上海市的罢工案件共一百二十八起。发生在上半年的仅三十起，下半年则有九十八起。^①后半年中发生的罢工，比1932年至1935年四年中间任何一年全年的案件都要多，而且其中包括着日商纱厂工人同盟罢工这样的大规模斗争。

从1936年秋季以来，上海纱厂的营业情况已大为好转。各日商纱厂日夜开工，星期日也不停止，并且无报酬地延长了工作时间。星期日一般要多做二至六小时的工。工人称之为“做礼拜工”。工人关车吃饭的时间，也被取消。这时，有些华商纱厂因营业回升，在工人逼迫下，工资已经略有增加。日商纱厂的工人大受刺激。而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范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更有力地推动工人起来斗争。

10月下旬，有几家日商纱厂的工人便此起彼落地进行了小规模罢工。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市“工联”（即上海产业总工会）所属的日厂工作委员会，仔细分析了工人的情绪和要求，决定把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经济要求和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正值绥东抗战，全

^① 《民国廿八年上海之罢工停业及劳资纠纷》：《国际劳工通讯》第7卷第6期第25页（1940年6月出版）。

国反日爱国运动高涨)结合起来,从而顺利地发动了日商纱厂的同盟罢工。

罢工自11月7日晚从沪东的大康纱厂开始^①,沪东大部分日商纱厂工人相继参加。罢工工人提出了五项条件:一、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二、不准打骂工人,不准开除工人;三、吃饭停车一点钟;四、恢复常工,不做礼拜工;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紧接着,沪西日商丰田纱厂的工人于11月17日晚间爆发了罢工。在这以前,丰田纱厂已有了工人救国会的组织。这时,以救国会会员与夜校学生为基础形成核心,发动了罢工。丰田纱厂罢工工人的要求,除增加了“释放被捕工人”一项外,和沪东日商纱厂工人所提的条件完全相同。18日,上海全部日商纱厂的五万工人全部卷入罢工。^②

同盟罢工形成后,国民党官办的上海总工会派人到丰田纱厂“监督”工人的活动。这正好给了罢工以取得合法的机会。党通过上海各界救国会,协助罢工工人组成了上海日厂罢工指挥部,加强了罢工的统一领导。

罢工指挥部以合法身份公开进行了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同时利用帮会头子、“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等人的“调解”,

① 大康纱厂工人罢工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不纯粹是经济罢工。原来,1936年2月初,大康纱厂发生过一个“梅世钧事件”,已经埋下了工人反日罢工的火种。梅世钧是大康纱厂工人,救国会员,在东北当过义勇军。2月初的一天,工厂看门人在搜身时查到了梅的一张着军服的照片。日人走来查问,并殴打梅世钧。梅受伤甚重,但仍被扭送法院,出来后即不治死去。事件发生后,许多工人主张罢工抗议,由于没有组织基础,罢工未能实现。从那时起,工人们就急于找寻机会,给日本资本家以反击。所以这次罢工,大康工人首先采取了行动。

② 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共有三十家,工人约五万人。据当时罢工领导者的记载,这些厂的工人全部参加了斗争。另据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统计,这次参加罢工的共有二十三个厂,工人三万七千八百零九人(参看《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一书第59—62页)。上海救国会《救亡情报》《援助日厂华工罢工号外》(1936年11月19日),则说是“四万余”。几种说法颇有参差,故并存以供参考。